

绿色城镇化的逻辑、 内涵与特征辨析

李恩平

摘要 通过研究人与自然共生和城镇化的相互演进关系，解析了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进逻辑，明确绿色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的历史对应关系；通过区分城镇化绿色转型的主体层次，归纳了绿色城镇化三个层面的深刻内涵，即微观主体生产生活内容绿色转型，城乡集聚单元空间绿色转型，人口、产业、产品迁转流通的城镇化过程绿色转型；根据绿色城镇化时空维度演变，揭示了绿色城镇化的阶段性、多样性、共享性（人民性）、全局性四大关键趋势性特征。推进绿色城镇化必须深刻把握这些典型的趋势性特征。

关键词 绿色 城镇化 生态文明 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851X (2023) 04 - 0040 - 12

一、引言

绿色城镇化是生态文明的城镇化理念，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镇化道路，是对工业化阶段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城镇化道路的反思和革命。绿色城镇化理念很早就被提出，“田园城市”、城市“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等都属于欧美早期城镇化过程中绿色城镇化理念的探索。近期，基于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国内外把低碳城市看作是绿色城镇化的核心内容。

纵观国内外绿色城镇化研究，国外文献基本上只有绿色城市、低碳城市提法，极少有绿色城镇化的说法，关于城镇化的提法更多的是可持续城镇化或城镇化的绿色转型等。国内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基础上也出现了绿色城镇化的研究热潮，对绿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项目“双循环新格局下绿色城镇化战略与推进机制研究”（批准号：GDZK - 2021 - 008）。

【作者简介】李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邮政编码：100710。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色城镇化理论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例如，魏后凯与张燕（2011）认为绿色城镇化应该是“资源节约、低碳减排、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城镇化；张双悦（2017）提出绿色城镇化应包含保护自然景观、传承历史文化、强化节能理念、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低碳便捷的交通体系、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等八方面的内容；张贡生（2018）提出“以人为本为其本质所在，两横三纵空间格局为其骨架，绿色城市群为其主体形态和支点，绿色产业为其内核，绿色制度为其保障手段”的绿色城镇化基本框架。张永生（2020）认为绿色城镇化应该“对已有城市进行重塑，以绿色方式实现未来新增城镇人口的城镇化，对乡村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王凯与陈明（2021）提出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审视自然、城市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绿色城镇化的制度框架和规划战略，完善人居环境的建设。

尽管绿色城镇化的相关国内外文献均有较多积累，但既有文献对绿色城镇化的历史逻辑、内涵内容和过程特征的认知仍存在诸多不足。其一，城镇化过程的逻辑关系没有很好理顺，城镇化的根本驱动在于城乡、城城、区域市场利益关系变化驱动人口在城乡、城城、区域空间的迁转重组。既有文献往往单纯的谈城镇和农村，更多强调了城镇或农村的局部绿色转型，忽视了城镇化过程的绿色联动关系，而且也更关注城镇的绿色发展而忽视了农村的绿色发展；其二，对绿色的理解，不少文献也偏于狭窄化，往往更多强调了低碳化，但低碳仅仅是减缓气候变化的特征之一，绿色化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部内容，包含生态优美、资源节约等更丰富内涵，诸如运输距离和通勤时间的缩短、市场效率的提升带来的节约和降低成本都是重要的绿色内涵；其三，对绿色城镇化的历史演变逻辑认识不足，缺乏对城镇化过程的历史逻辑分析；其四，对绿色城镇化的趋势性特征没有很好把握，城镇化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时间空间重组，绿色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区域不同空间和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重大发展利益重新分配，需要深刻把握其时空利益的典型趋势性特征。

为了更精准理解绿色城镇化，本文从城镇化的城乡联动过程和全面绿色发展两方面深入解析了绿色城镇化演变的历史逻辑和本质内涵，研究了绿色城镇化过程所表现出的典型趋势性特征。

二、绿色城镇化的文明发展逻辑

人类文明是人与自然联动演进的过程，城镇化是人类文明伴随的重要特征，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的绿色共生关系。因此，理解绿色城镇化的学理逻辑需要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演进过程来解析。不少的文献从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视角分析了为什么要推进绿色城镇化，但由于未能把握城镇化过程中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演进逻辑，往往只能用“要”“只能”等有主观意愿而非历史学理逻辑来阐释绿色城镇化的必要性。

首先，城镇化是城镇和农村两类不同形态集聚空间转换的过程。城镇是以工商业

为主导产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农村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农村和城镇两类集聚空间不断的转化转换，不同文明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城镇化特征阶段。其次，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人类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人与自然共生演进过程。人类是开发、利用和征服的主导者，自然是被开发、利用和征服的对象，但人类又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居住的地球是人与自然万物共同的家园。因此，城镇化的进程实际上也是不同文明对应的人与自然共生的演进过程。人类文明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发展开始迈入生态文明时代。

（一）农业文明时期的城镇化进程

农业文明时期，生产率低下，人口增长低缓。据文献估算，公元350年的全球人口也仅2.55亿，直至工业革命前夕的1650年，全球人口才突破5亿（乌拉拉尼斯，1982）。由于以农业生产为主导，人口和经济活动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城镇主要表现为行政中心和军事基地，工商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工业生产主要为手工作坊，难以吸引和承载过多的非农就业人口，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城镇化水平也较低。在人口低生产率、人口低速增长和低水平城镇化率的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基本上维持一个相对协调状态。在以农村为主的农业文明中，尽管个别城镇和农村可能存在较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但生态环境总体上是可控、可自我修复的。因此，农业文明时期的城镇化是低水平的人与自然相对协调的城镇化。

（二）工业文明时期的城镇化进程

人类社会迈入工业文明时期后，生产率水平不断提升，由于不断深化的分工、专业化和农产品消费需求弹性下降，工商业生产和就业持续增长，形成了农业劳动人口对城镇工商业的持续转移，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在工业文明时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不对称性、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不对称性，必然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不可持续发展。工商业消费服务的大众化使得人类生产与自然承载力不对称。由于医疗技术进步和大众化服务的推进，人类的预期寿命快速增长，短时期内人口死亡率大大低于人口出生率，造成全球人口总数快速增长和快速城镇化。1850年的全球人口不到10亿，1960年的全球人口突破40亿，2022年的全球人口突破80亿（United Nations, 2022）。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口增长，也伴随着快速城镇化，1800年的全球城镇化率低于10%，1950年的城镇化率也仍然低于30%，但2018年的全球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5%（United Nations, 2018）。人口快速增长和快速城镇化使得全球人口与自然出现紧张型共生关系，为了满足不断增长人口的物质消费，工业生产形成了对全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资源开发的不可持续性；人类生产生活废品、废水、废气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广泛依赖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过度的二氧化碳排放形成地球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性气候变暖。

工业文明时期，工商业生产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使得城镇化、工业化出现了显著的多层面两极分化趋势。一是形成显著的城乡对立分化趋势，导致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由于农产品相对于工业产品具有更小的收入需求弹性（不断下降的恩格尔系数），使得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往往出现不利于农业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导致工农（城乡）收入比出现长时期的拉大趋势。相对贫困化的农村人口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加快自然资源的开发进程，出现了农村自然资源的竭泽而渔，导致农村发展的不可持续。二是形成显著的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对立分化，导致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可持续。工业文明不加约束的集聚效应也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高端产业链愈益集聚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国家和地区之间明显的产业层级分工和明显的发达与欠发达分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为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往往形成对本国本地区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区域生态环境恶化。三是形成城市内部明显的贫富分化，导致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由于资本和土地空间占有不均衡，城市内部也必然形成个体之间的贫富分化，导致城市整体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生态文明呼唤绿色城镇化进程

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发展呼唤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有不少经济社会学者提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罗马俱乐部揭示了增长的极限（梅多斯等，1972），联合国1992年发布的《21世纪议程》为各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采取行动和开展国际合作提供指导原则、规定一般义务。随着碳排放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被认识，全球各国围绕降碳减排举行了一系列峰会，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巴黎协定》《哥本哈根协定》《坎昆协议》等系列国际性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文件。

在各国特别是主要工业化国家反思全球可持续发展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针对城乡发展差距提出乡村振兴和美丽中国，针对贫富分化提出共同富裕和脱贫攻坚，针对区域发展差距提出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大江大河流域性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就全球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我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提出推进以绿色为主要特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显然，生态文明的发展思路是对工业文明不可可持续发展的反思，生态文明的城镇化进程也将伴随生态修复、环境治理、减缓气候变化，必然是绿色城镇化。

三、绿色城镇化的内涵内容

绿色城镇化，顾名思义，其内涵需要从绿色和城镇化两方面来综合解析，仅仅谈城镇化失去了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绿色特征，仅仅谈绿色则泛化为绿色发展，不能把握城镇化的趋势、规律。

绿色是城镇化的方向和目标。尽管绿色发展已经是共识，但对绿色发展内涵的认识并不一致，不少文献把绿色发展等同于低碳发展、生态发展等。本文认为绿色发展

具有更广泛的发展内涵，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绿色发展必然是低碳、零碳发展。由于过度碳排放导致地球气候变暖，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绿色发展必然要求低碳、零碳发展，碳达峰碳中和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二是绿色发展必然是无污染的、生态相容的发展。绿色发展不仅关注全球生态，更关注所在区域生态，要求实现所在区域生态相容的发展。首先，要求无污染，废气、废水、废物均实现了最少的排放、最少的产生，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回收利用；其次，生态相容的发展也必然是生态景观的美丽优化和生态环境的自然承载力改善，意味着更好的植被覆盖、不断改善的土地和水利环境，更强的防洪抗旱能力。三是绿色发展必然是资源能源节约式的高效率发展。由于过度的资源开发必然导致地表环境的破坏，绿色发展必然要求减少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消耗和依赖，在维持同等发展水平或同等产出水平条件下，更高效率的资源能源利用意味着能源资源的节约。

绿色城镇化也必然遵循城镇化过程特征，其绿色特征的内涵贯穿城镇化过程各环节。城镇化是人口与经济活动从以农业为主导的农村居住空间到以工商业主导的城镇居住空间迁转的过程，一方面是城镇居住空间的集聚扩张，另一方面是农村居住空间的逐步退出。在较大国家和区域内，城镇化也是人口和经济活动从次级发展区域到主导发展区域的迁转过程，一方面是次级发展区域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退出，另一方面是主导发展区域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扩张。绿色城镇化贯穿城乡、区域人口和经济活动迁转的全过程。因此，不仅要分析各城镇、乡村、主导发展区域、次级发展区域等空间单元的绿色发展，也要解析城镇化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单元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的绿色行为，还要解析各空间单元之间绿色发展的差异性、协调性和整体的绿色经济性。

综合绿色和城镇化两方面发展演进要求，绿色城镇化就是要实现城镇化进程中生产、就业、生活消费和储运各过程环节的绿色转型和城乡居住空间的生态相容，包含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中观城乡集聚空间的生态环境状态和宏观跨区人口与经济活动迁转效率三个层面的绿色转型，如图1所示。

第一个层面是要实现微观层面各经济行为主体生产生活内容的绿色转型。一是实现产业发展的绿色转型：大力提升绿色无污染的高科技产业比重，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型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技术改造；企业生产遵循循环经济，强化对废物、废水、废气利用，生产节约、生产节能、注重生态环保，实施严格的污染控制。二是推进能源利用的绿色转型：实现从化石能源到风、光、水、核等绿色新能源转型，主要依托新能源资源富聚地区大力推进太阳能、风能发电，建设大型新能源供应基地，积极推进以特高压为主的电力跨区输送通道设施建设，促进跨区新能源消纳，大力提升工业、交通、建筑动力的电气化程度，提升新能源利用水平；大力推进新能源储能技术和储能产业发展，稳定新能源电力供应。三是家庭生活奉行绿色健康消费，实现节约转型，树立绿色健康消费观，反对商品消费过度 and 浪费；从源头减少生活垃圾，严格倡导生活垃圾分类，促进生活垃圾循环利用；树立高度的节能节水意识，注重居住空间的生态环保和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循环利用。

第二个层面是要实现中观层面城乡、区域集聚空间生态环境的绿色转型。一是宏观上要实现人口和经济活动从生态脆弱区向生态韧性区迁移，减轻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降水量较大、气候较温和湿润的沿海地区将成为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城镇化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要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在一些干旱、半干旱地区，例如，我国胡焕庸线以西以北地区，干旱少雨，土地沙漠化严重，植被稀薄且容易被破坏，应实施退耕退建、还林还草，恢复植被覆盖，实现沙漠改造。二是中观上要实现城乡空间的高效运行，按照通勤效率组织产城、职住空间关系，减少无效、低效通勤，以单纯就业移民为主导的城市适合较大型的独立工矿区产城模式，以家庭城镇化为主导模式的城市则适合更紧密的产城融合发展，大都市内适合主导产业分工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分区，力求都市内实现就业、居住、服务平衡发展，减少通勤距离；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与城市产业层级、居民居住需要相适宜。三是微观上要建设环境友好社区和绿色环保建筑，城乡社区建立全覆盖的生活废物、废水回收处理机制，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行节能材料建筑和太阳能发电利用，实现绿色城市、海绵城市、生态城市转型。

第三个层面是要实现城乡、城城、区域间人口迁移、产业转移和产品贸易的城镇化过程绿色转型。一是实现产品贸易的绿色转型。商品生产和储运要做到对沿海沿江廉价水运和能源资源供给的两个临近，从而最小化运输成本和运输能耗。特别是随着消费结构个性化、多样化升级和产业链精细分工、专业化延伸，生产和消费供需市场范围越来越大区域化、全球化，运输成本占比越来越大，具有低成本廉价水运的沿海港口城市区位优势突出，产业特别是具有较高运输成本的高贸易型产业布局沿海地区将意味着运输成本和运输能耗的巨大节约。二是实现服务通勤的绿色转型，关联度高、服务贸易密切的产业链实现近距离产业分布对远距离产业分工的替代，减少贸易运输和服务通勤的空间距离、成本和能耗。三是实现人居模式的绿色转型，交往密切人群和家庭近距离居住、家庭人口相随居住（避免两地分居），为就业人口提供近距离的就业-居住空间，减少就业人口上下班通勤距离，节省通勤交通能源消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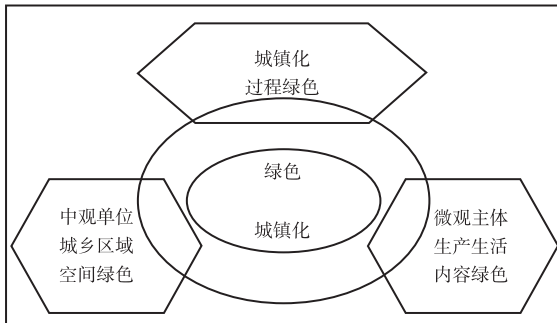


图1 绿色城镇化内涵的层级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绿色城镇化的趋势性特征

绿色城镇化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时间和空间的多维度绿色转型，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城镇化和绿色转型均存在若干固有的趋势性特征。根据绿色城镇化的发展逻辑和内涵，应重点把握阶段性、多样性、共享性（人民性）、全局性四大关键的趋势性特征。

（一）绿色城镇化的阶段性

绿色城镇化的阶段性源于城镇化的阶段性。人口城镇化的根本驱动在于城乡市场的利益差距，城乡人口对城乡市场利益的分享也并不一致，劳动人口主要分享城乡就业收入利益，非劳动人口主要分享城乡居住生活利益。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城乡就业收入利益差距与生活消费利益差距也存在不同的变化趋势。因此，导致不同人口的不同步城镇化进程。不同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对城乡、区域绿色转型存在不同要求，这导致绿色城镇化表现出显著的异质人群绿色转型差异的阶段性特征变化。

第一，城镇化速度存在先升后降倒U形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对应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和城乡空间绿化需求也存在先升后降趋势。联合国等诸多文献表明，城镇化水平存在S形变化、城镇化速度存在先升后降倒U形变化趋势，在大致21%—79%的城镇化进程中后期阶段，表现出明显较快的城镇化速度。与倒U形城镇化水平速度变化相对应，城镇建设用地总需求也存在先升后降规律，快速城镇化中期阶段的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最大，城镇化后期阶段的建设用地需求将大大下降，特别是在总人口存在负增长态势下，到城镇化后期，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将急剧下降。伴随着城镇化速度变化的城乡绿化空间需求也存在阶段性变化，城镇化前期，农村人口承载压力大，农村人口为了生存需要对所在地区农业、林业资源实施耗竭式的开发，导致区域性生态环境剧烈变化，城镇建设也重点放在工业化，而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绿化建设关注较少，往往出现高密度、低绿化现象；城镇化中后期，农村地区由于持续人口迁出，人口承载压力下降，也由于生活水平提升，农村居民也更关注自身生态环境，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逐渐向绿色转型。城市地区也同样由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消费结构升级对人居环境的绿化要求提升，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城改造，城市内部也出现明显的绿色转型。

第二，城镇化存在劳动人口先行、非劳动人口滞后跟随的阶段性规律，对应城乡产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结构比率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也对应城镇化绿色发展转型要求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城镇化存在劳动人口先行（农民工就业城镇化）、非劳动人口滞后跟随（农民工家庭迁移）的主导人口变化规律，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城镇化进程差距表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形成以50%城镇化水平为拐点的倒U形变化趋势（李恩平，2019）。与城镇化主导人口变化趋势相对应，城镇建设用地需求也存在用地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前期，工业化和就业城镇化对应了城镇产业用地需求的快速

增长；经济发展中后期，举家迁移居住生活城镇化对应了城镇居住用地需求的快速增长。此外，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人均居住空间需求和绿色生态空间需求也快速增长。这进一步加剧经济发展中后期的城镇居住用地需求增长，城镇绿色公共用地需求也将迎来快速增长。

第三，城镇化总体上是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资源节约的过程，但由于农村建设用地退出存在滞后性，使得城镇化全过程中城乡建设用地总量表现出先升后降阶段性特征。农村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工商产业集聚程度较低，不考虑农业设施用地，则农村建设用地主要表现为宅基地，由于非劳动人口跟随城镇化的滞后特性，农村居住从而宅基地退出不随劳动人口城镇化而变化。由于劳动人口城镇就业带来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在未能举家迁移之前，农村家庭往往需要改善农村居住空间——新建或扩建农村住房，这使得城镇化中前期的农村建设用地不会退出而且可能出现快速增长。只有当农村家庭完成了迁移城镇化，迁出地农村住房和宅基地才会逐渐退出，在快速城镇化地区，举家迁移以后的农村住房和宅基地退出也可能有数年、十数年的滞后期。

（二）绿色城镇化的多样性

城镇化是全社会统计意义的城乡人口迁移，是众多农村与众多城镇之间的空间格局变化，是不同农村、城镇和区域的联动。不同的农村、城镇和区域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巨大差异，城镇化进程中的绿色转型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异，表现出绿色转型的多样性。

第一，城镇化区域绿色转型存在显著的多样性要求。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自然和经济地理差异，不同自然和经济地理区域的城镇化对绿色转型具有不同的要求，生态韧性强的地区能承载更高密度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容更多在于当前人居环境的绿色相容性。生态脆弱地区能承载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往往受到生态承载极限，过度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可能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我国是一个沿海内陆兼具、南北差异明显的大国，区域之间生态环境差异显著，东南沿海降水量丰富、气候湿润，非常有利于植被生长，生态修复能力强，生态条件优越，有非常高的人口和经济活动承载能力，绿色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于区域内当前可感受的绿色人居环境建设。中西部内陆地区基本上属于大江大河上中游，区域内生态环境变化不仅对本区域产生影响，而且通过水流、风向对下游地区产生影响，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更加突出，特别是西北内陆地区基本上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降水量少，植被成长缓慢且容易被损毁，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人口和经济活动很容易导致区域生态环境不可修复，形成水土流失和沙化，绿色城镇化不仅要关注当前人居环境的生态相容性，还要高筑国家地理生态屏障，不仅要美化优化所在城乡本身的生态环境，还需要从全区域考虑生态承载合理性。

第二，城镇化的城城绿色转型存在显著多样性要求。一是不同区域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绿色生态要求，如上所述，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南部城市与北部城市之间存在

显著绿色转型差异。东南沿海沿江城市往往本身水网密布，城市生态几乎不需要专设水体的绿化公园，也无需布局大型环城绿化带。北部较干旱地区的城市，为了增加人居环境的生态相容性，往往要建设专用的较大型环城绿化带和专用的水体公园设施。二是不同规模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绿色生态要求，超大城市、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往往城市人口规模大、建成区面积大，为了改善大规模城市人居环境，往往在城市内部建设各类专用的城市绿化带和绿化公园、休闲公园；中小城市由于人口规模和建成区面积小，往往被外围农业、林业用地包围，类似于公园中建城市，因此不必过多追求城市绿化公园、建绿化带。

第三，城镇化的村村绿色转型也存在显著多样性要求。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总体上面临人口逐渐退出和经济活动的相对退出，这为农村整体的退建还农、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机遇。不同类型的农村，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相对退出也存在很大差异，对绿色转型也存在显著多样性要求。例如，在农村建设用地方面，一些人口数量很少的山区农村小型自然村庄，可以实施迁村并镇；一些交通条件较好、经济也相对发达的较大村镇，可能形成农村地区的小型集聚中心，不但不会出现退耕退建，还可能导致建设用地扩张。绿色城镇化不能片面要求退耕退建，应允许适当的建设用地扩张，要保持邻近区域总体上的还耕还林。再如，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尽管所有农村都应进行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但小型自然村特别是一些分散居住的山区自然村有一定的自然净化能力，且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成本极高；有些山区自然村拥有良好的山泉，也不必要片面调取更下游的高成本自来水。

（三）绿色城镇化的共享性（人民性）

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利益格局的变化，尽管城镇化总体上是城乡发展整体利益的改进，是城乡福利的整体提升，但在实际的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发展利益分享并不均衡，城镇化的利益改进也并不总是帕累托式改进。绿色城镇化则是要让城镇化的发展利益能够让城乡居民更多共享，更多追求帕累托式或优化补偿的希克斯式城镇化利益改进，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绿色城镇化的目标。

第一，绿色城镇化必然要以人为核心。城镇化进程中，既要让城市原有人口分享城市增长的发展红利，先富裕起来，也要让跨区新移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为新就业移民家庭举家城镇化提供低成本的保障性住房供应，还要通过基础设施普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镇化迁出地农村人口同样分享城镇化发展红利。为此，2012年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保障性住房工程和乡村振兴等系列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核心的民生工程。

第二，绿色城镇化必然要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由于迁移成本、文化等多方面影响，人口城镇化和跨区人口迁转不能完全按照区域区位和资源禀赋条件实现最优的区域人口承载，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短时期内可能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均衡。欠发达地

区，人口承载相对于经济产出表现出相对过度，人口相对过度承载必然导致对本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对生态环境的过度承压和破坏。因此，绿色城镇化必然是区域均衡发展的城镇化，在市场配置手段无法实现人口迁转和区域均衡的发展成果分享情况下，需要通过适度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和政策，鼓励更适合欠发达地区本地市场化的产业迁转承接，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多种手段缓解欠发达地区低收入人口的相对贫困。

第三，绿色城镇化也必然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城镇化是人口和资源空间重组的过程，必然伴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居民之间收入和财产不均等，往往激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完全的市场规则很容易使得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形成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矛盾对立，既导致社会不稳定，也很难形成不同层次居民之间消费结构联动升级，抑制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城镇化就是要通过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生态环境资源的绿色价值重构，通过更具外部效应的绿色价值服务，带动欠发达地区更快发展，促进低收入人群分享绿色发展收入，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四）绿色城镇化的全局性

城镇化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乡、区域间的空间和市场重组，更具有全局性，衡量城镇化发展绩效不能仅仅看到城乡、区域的一地一时发展表现，需要从城镇化的全局性整体考察，从城镇化的全过程动态考察。绿色城镇化就是要按照全局性、整体性、动态性的要求引导城镇化走绿色发展道路。

第一，绿色城镇化必须坚守国家生态屏障。对于地域辽阔、海陆兼具、经济地理差异明显的国家，总存在一些具有重大外部性生态影响的生态脆弱区。例如，我国以胡焕庸线区分的西部、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由于数千年来不断加重的人口承载和农牧生产，导致出现不断扩大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荒漠化，形成影响严重的沙尘暴和泥沙。绿色城镇化必须坚持对重要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通过人口外迁和集聚，减轻这些地区农牧业人口承载，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坚守国家重要生态屏障。

第二，绿色城镇化必然强化流域联动性生态保护与开发。大国生态环境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大江大河流域性，形成各自的流域性生态环境空间，依托江河水运和水资源，也往往形成依托江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城镇化迁转路径。江河上中游流域也主要处于内陆山区，生态环境十分优美但脆弱，由于上风上水，生态环境变化对下游产生重要影响，上游过度的城镇化、工业化形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必然对下游造成严重溢出性影响。因此，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大江大河流域性开发保护联动，流域下游地区应成为主要的开发区域，流域上中游地区则应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

第三，绿色城镇化必然响应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与应对。对于经济贸易高度全球化、存在深刻影响地球变迁的全球气候变化，绿色城镇化更具有显著的全局性特征。为了维护共同的地球家园，绿色城镇化不仅要注重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影响，还需要

注重城镇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绿色城镇化必然也是低碳的城镇化进程。一是要积极推进水、风、光、核等绿色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替代；二是要积极推进能源节约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三是积极推进电气化；四是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和荒漠绿化治理，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植草，加强对大型原始森林、草原保护。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针对绿色城镇化既有文献存在的一些理论认知误区，辨析了绿色城镇化的发展逻辑、内涵和趋势性特征，这对推进绿色城镇化的战略和政策制定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归纳起来，以下结论和政策启示可能是重要的。

(1) 人类不同发展阶段对应了城镇化的不同特征，绿色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对应了不同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生态文明将开启生态保护修复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关系，必然走绿色城镇化道路。

(2) 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微观、中观和宏观过程全方位绿色转型。既要实现微观层面各经济主体生产生活内容的绿色转型，也要实现中观层面各城乡单元空间的绿色转型，还要实现城镇化动态过程中人口迁移、产业转移、产品流通贸易的绿色转型。单纯强调某个微观主体、某个中观单元或某个动态环节的绿色转型，都可能造成城镇化整体的低效率和非绿色。

(3) 推进绿色城镇化也应深刻把握其阶段性、多样性、共享性（人民性）和全局性的趋势性特征。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城镇化不同阶段对绿色发展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应该遵循城镇化不同阶段绿色需求特征推进绿色城镇化进程。城镇化也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差异，不同地域空间的绿色发展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应深刻把握城镇化的多样性特征，因地制宜推进绿色城镇化。城镇化是城乡区域和人群利益格局的重组，绿色城镇化强调发展利益的共享，需要通过多重外部性补偿机制推进高度共享的绿色城镇化。衡量城镇化发展绩效不能仅仅看到城乡、区域的一地一时发展表现，需要从城镇化的全局性整体考察，要按照全局性、整体性、动态性的要求引导城镇化走绿色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李恩平（2019）：《不一致的城乡利益分享与不同步的城镇化进程》，《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66—78页。

[美] 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1972）：《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

王凯、陈明（2021）：《中国绿色城镇化的认识论》，《城市规划学刊》第1期，第10—17页。

魏后凯、张燕（2011）：《全面推进中国城镇化绿色转型的思路与举措》，《经济纵横》第9期，

第15—19页。

[苏] 乌尔拉尼斯 (1982): 《世界各国人口手册》, 魏津生等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10页。

张贡生 (2018): 《中国绿色城镇化: 框架及路径选择》,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123—132页。

张双悦 (2017): 《走绿色城镇化道路: 内涵、外延及路径选择》, 《经济研究参考》第23卷, 第95—100页。

张永生 (2020): 《基于生态文明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转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题政策研究报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0期, 第19—27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国务院公报》第9号。

United Nations (2018):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8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Analysis of the Log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Urbanization

LI En-pi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s several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related to green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mutual evol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ymbiosis and urb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logic of green urbanization is analyzed, and the historic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r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clarified. By distinguishing the main levels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urbanization,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three levels of green urbanization are summarized: namely,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fe content of micro entitie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gglomeration unit space, and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through the migr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population, industry and products. Based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green urbanization, the four key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urbanization, including stage, diversity, sharing (people-oriented) and overall, have been revealed. To promote green urba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grasp these typical trend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green; urban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周枕戈